



晚清與五四，絕非簡單的否定。

它們是中國文學生生不息的「現代」河流中兩個精彩的瞬間。

以往的文學史敘述，誤讀了哪些，又遮蔽了哪些呢？

流動的 瞬間

— 晚清與五四文學關係論

楊聯芬／著

流動的瞬間

—晚清與五四文學關係論

楊聯芬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流動的瞬間：晚清與五四文學關係論 / 楊聯芬
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6[民95]
面； 公分. -- (大陸學者叢書；CG0010)
參考書目：面
ISBN 986-7080-45-9(平裝)

1. 中國文學 - 歷史 - 晚清(1840-1911) 2.
中國文學 - 歷史 - 民國(1912-) 3. 中國
文學 - 評論

820.907

95008490

流動的瞬間 ——晚清與五四文學關係論

作者 / 楊聯芬

發行人 / 宋政坤

主編 / 宋如珊

執行編輯 / 林秉慧

圖文排版 / 張慧雯

封面設計 / 莊芯媚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銷售發行 / 林怡君

網路服務 / 林孝騰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 : 02-2657-9211 傳真 : 02-2657-9106

E-mail : 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 : 02-2795-3656 傳真 : 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ISBN-13 / 978-986-7080-45-5

ISBN-10 / 986-7080-45-9

2006 年 7 月 BOD 再刷

定價 : 27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總序

1992 年，兩岸開放探親後的第五年，我在埋首撰寫論文〈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況〉過程中，驚覺對岸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投入成果，並在種種因緣之下，開始關注對岸文學，一頭栽進大陸文學的研究與教學。

多年來，心中一直記掛著應該把台灣的大陸文學研究情況也整理出來。因為台灣和大陸是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兩大陣地，除了兩岸學界的本土文學研究之外，還須對照兩岸學界的彼岸文學研究，才能較完整地勾勒現代華文文學研究的樣貌。去年，我終於把這個想法，部分地呈現在〈台灣的「大陸當代文學研究」觀察〉一文中。但是，這個念頭的萌發到落實，竟已倏忽十年，而在這期間，仍有許多想做和該做的事，尚未完成，不禁令人感慨韶光的飛逝和個人力量的局限。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的現代華文文學研究，兩岸都因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的變遷，日益開放多元；近年更因大量研究者的投入，產生豐盛的研究成果，帶起兩岸文學界更加密切的交流。兩岸的研究者，雖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成長，但透過溝通理解、互動砥礪，時時激盪出許多令人讚嘆的火花。

「大陸學者叢書」的構想，便是在這樣的感慨和讚嘆中形成的。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成果的交流和智慧的傳遞，是兩岸文學界最有意義的雙贏；於是我想，應從立足台

灣開始，將對岸學者的文學研究引介來台，這是現階段能夠做也應該做的努力。但是理想與現實之間，常存在著難以克服的主客觀因素，台灣出版界的不景氣，更提高了出版學術著作的困難度。

感謝秀威資訊公司的總經理宋政坤先生，他以顛覆傳統的數位印製模式，導入數位出版作業系統，作為這套叢書背後的堅實後盾，支持我的想法和做法，使「大陸學者叢書」能以學術價值作為出版考量，不受庫存壓力的影響，讓台灣讀者有更多機會接觸到彼岸的優質學術論著。在兩岸的學術交流上，還有很多的事要做，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相信，這套叢書的出版，會是一個美好開端。

宋如珊

2004年9月 於士林芝山岩

序

楊聯芬女士的著作《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即將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她把書稿送來，邀我作序，我欣然答應了。

我認識聯芬女士，是在九年前北師大中文系舉行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當時的印象是：她有才氣，肯下工夫，論文有分量，文筆也不錯。留校任教後則聯繫不多。有時見到她在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卻來不及一一閱讀。這次系統地讀了她的書稿，作者在學術上達到的深度與廣度，不免令我吃驚，我才意識到站在我們面前的，已是一位頭角崢嶸、目光四射、相當出色的青年學者了。

這本著作並不全面敘述晚清到五四時期的文學歷史，但卻從發掘「現代性」的特定角度，深入考察了這一時期幾個十分突出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鉤沉析疑，燭幽發微。就人們熟知的若干老話題闡釋出極富啟發性的新見解，中肯而又精警，很有學術價值。其中第三、六、七諸章，我認為寫得尤其精彩。

晚清文學資料多而分散，長期沒有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最近一二十年雖然出了一批重要學術成果，但相對而言基礎仍較薄弱。而且，誠如作者所言：「閱讀晚清小說，與其說是閱讀文學，不如說是閱讀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和歷

史」，往往會經歷「一個極其枯燥乃至絕望的閱讀時期」。可貴的是，作者在這種情況下知難而進，充分佔有原始材料，敢於突破前人陳見，積數年艱苦努力，終於獲得令人欣慰的果實。真正的研究工作絕不只是「命名」，也不是對已有成果進行並無多少新意的「排列組合」，而是必須在學科領域內形成實質性的推進。楊聯芬的著作，我以為實現了這一目標。

就我的閱讀感受而言，本書不是一般地討論文學的現代性，它最出色的部分體現了三個特點：

一，進入歷史的具體情境，充分體察歷史本身的複雜豐富與多樣。

以研究林紓的部分為例，作者具體考察了他用古文翻譯一百幾十部西方小說的情況以及他作為譯者所寫的大量序跋在當時環境中起到的作用；還搜集盡可能多的資料，論證他的譯作對不止一代文學青年（包括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李劫人、錢鍾書等）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作者據實指出：「由於林紓深厚的文學功底與敏銳的藝術感覺，他往往對原著的風格，有深刻的領會。他用古文，竟然能夠惟妙惟肖地傳達西方原著的幽默，這已為眾多現代作家所折服。」並認為：林紓「借翻譯域外小說，為中國人打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不但將西方小說推上新文學之師的位置，而且使小說這一樣式悄悄蛻去『鄙俗』的陳套，換上了『雅』的衣衫。」這「正是那個時代調和雅（古文）、俗（小說），溝通中、西的最適當的橋梁」。即使「林氏的誤讀雖常常掩蓋了西方原著的人文主義光彩，但卻也是晚清那個時代廣大

士人階層可能接受和理解西方的最好策略。」在作者看來，林紓強調中西之「同」，實際上提高了舊派對西方的認識：「一是讓他們認識到西方文學與中國文學是相通的，『勿遽貶西書，謂其文境不如中國也』；二是讓他們知道西方人與中國人有許多相同的人性與人倫，並非無父的野蠻人。」如果「我們多少能夠體會晚清文學轉型的艱難，對林紓的誤讀也就多了幾分理解。」

對於林紓與五四新文學家的論爭，本書也作了深入的考察，連錢玄同、劉半農借虛構的「王敬軒」「設陷阱讓林紓上套」這類細節都注意到了。作者不但指出林紓性格狷介真率、拒絕袁世凱的拉攏，也介紹了庚子年間他在杭州「作白話道情，頗風行一時」的事實，從而如實地得出「林紓與新文化的分歧，並非是否使用白話，而是是否使用白話就一定廢除古文」這一結論。作者認為：「以五四激進主義為視角的文學史，由於『省略』了一些偶然事件的細節，一方面這個過程被簡化，另一方面這場帶有很強策略表演的論戰，在歷史主義的梳理下，帶上某種虛假的崇高色彩；在這種色彩中，林紓的形象是扭曲的。」但作者又認為，指出「五四一方」存在「為求『實質正義』而犧牲程序正義」的現象，「不是要對『正義』的結論進行否定，而是盡可能在解讀歷史進程的某種偶然性或非理性時，對歷史有一點更豐富和博大的理解。」這些看法都是比較公允和令人信服的。

二，良好的藝術感覺，富有靈氣的文字表述。

例如，對晚清重要作家蘇曼殊的論述，就頗得其神韻和氣質。蘇曼殊是一位極富才情、極有個性的作家。他是中國最早

譯介拜倫、雪萊的人。他的小說創作既開了「五四」浪漫主義的先河，也影響過民國時期的鴛鴦蝴蝶派。作者結合蘇曼殊的獨特經歷和藝術淵源，對他的詩給予了切中肯綮的評價：

……這是一個典型的傷感的浪漫主義者形象。
「契闊生死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已似冰。」（《過若松汀有感示仲兄》其二）灑脫與豪放之中的孤獨、憂鬱，活畫出曼殊迷人的魅力來。曼殊的詩，尤其是那些書寫離愁別恨、感慨飄零人生、記載愛情的詩篇，「其哀在心，其豔在骨」，雪萊式的幽深綿渺的品格，最令五四浪漫青年傾倒。

作者指出：「從意象、用典看，蘇曼殊是古典的；但從表現的真誠、大膽，感情的純潔看，蘇曼殊的詩是現代的，充滿了拜倫式的浪漫情懷，也具有雪萊式的感傷和細膩。」關於蘇曼殊的那些中長篇小說，作者認為代表作應該是《斷鴻零雁記》，「最大的價值就是它完全顛覆了傳統小說的敘事模式和理念。它不再像傳統小說那樣，以情節敘述為中心，追求對人的外部生活情境的真實模仿；《斷鴻零雁記》採用的是詩化的敘事，它的語言是主觀表現的，追求的是對人物心靈的表現。我們通常說，五四小說完成了中國小說由講故事到表現（向內轉）的現代性轉化，……但它的發端，卻不能不追索到民國初年的蘇曼殊小說《斷鴻零雁記》。」「從《斷鴻零雁記》開始，中國小說中出現了一種飄零者形象。」作者上述藝術感覺和藝術判斷，不能不說都是準確而符合實際

的。尤其重要的是，作者還指明了蘇曼殊的特殊性：「與同時代的其他從事文學的人相比，蘇曼殊的文學活動最接近自然和『非功利』，這與晚清以來的主流啟蒙文學是不一樣的。也正因此，他的作品在啟蒙派作家那裏，始終不會有太高的評價——除了少數朋友陳獨秀、章士釗等。但他的浪漫主義風度，卻贏得了多情善感的（五四）年輕浪漫派的認同。」對於我們理解蘇曼殊的文學史地位，這些見解也都是相當剴切而有意義的。

三，寬廣的學術視野與縱橫錯綜的比較方法。

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以來，曾樸的《孽海花》一直被定位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其實，魯迅本人對《孽海花》的評價較高，既稱之為「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復譽其人物刻畫「亦極淋漓」，顯然有別於《官場現形記》、《近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那類作品。楊聯芬則進一步將《孽海花》從「譴責小說」中提升出來，與李劫人的《死水微瀾》三部曲放在一起，定位為「現代長篇歷史小說」。她認為：「《孽海花》歷史敘事的現代性體現在：它擺脫了一般歷史小說以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歷史人物為中心的模式，不是演義『正史』，而是展現一種由世俗生活構成的『風俗史』；它塑造的人物，是一種可能更多借助於虛構的，而且在道德品性、行為方式、經歷和業績上都不帶崇高色彩的『非英雄』。」這和李劫人採用「把實際存在的歷史變成藝術的具文」的方法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作者看來，「中國現代長篇歷史小說的開拓者，應當是曾樸，而完成者，是李劫人。」

楊聯芬從「風俗史」角度對「現代長篇歷史小說」所作的界定，也許會在學術界引起某些不同意見。因為，最具有「風俗史」色彩的巴爾扎克的長篇系列小說《人間喜劇》，至今未見有人稱之為「歷史小說」；作為歷史小說，自不免與「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歷史人物」有一定的關聯。但是，即便現代歷史小說的定義及文字表述尚待完善，我們仍不能不承認本書作者有關曾樸《孽海花》和李劫人《死水微瀾》三部曲的見解，不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是頗為精當的。《孽海花》的確「透露著現代審美意識的新鮮氣息」，也「是晚清小說中結構最具長篇小說有機性的一部」。同樣，作者依據曾樸在法國文學方面的實際學養而作的下述判斷，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孽海花》的『歷史小說』意識顯然更多吸收了法國近代歷史小說的敘事觀念，即以包羅萬象的世態風俗描繪展示時代的風雲變幻與社會歷史進程，而在女主人公的刻畫和審美評價及道德評價上，明顯與傳統小說的女性觀不同，體現著以雨果為代表的法國浪漫派文學（似乎又不限於浪漫派文學——引者）的人文精神。」「《孽海花》的可貴，正在於它的『出格』。作者幾乎完全擺脫了傳統道德觀念和傳統小說的善惡模式，向讀者昭示：金雯青的窩囊、無能，恰恰反映了人性中非理性力量的強大；而傅彩雲惑人的美麗與情欲、她『磊落』的淫蕩，都令人想到法國文學從莫利哀到雨果，從巴爾扎克到福樓拜作品中那些風情萬種而又道德越軌的女主人公。」「曾樸的《孽海花》因為深入和生動地描繪了傅彩雲、金雯青這樣一類歷史進程中的『俗人俗物』，描繪了他們真實的人性和他們很難用『善』

『惡』進行衡量的道德行為，及由他們的生活所聯繫起的千姿百態的世態人生，使這部小說顯得那樣元氣淋漓（此四字為引者特別欣賞，故標以著重號——引者）。幾乎是在三十年後，新文學領域才又出現了李劫人《死水微瀾》《暴風雨前》這樣充滿現代歷史意識和浪漫詩情、結構恢弘的『風俗史』。郁達夫稱曾樸為『中國二十世紀所產生的諸新文學家中』『一位最大的先驅者』，『中國新舊文學交替時代的一道大橋梁』，是不過分的。」在對《死水微瀾》中羅歪嘴與蔡大嫂以及《暴風雨前》中郝香芸、伍大嫂等形象作了相當深入的分析之後，楊聯芬也說：「這些地方，使我們感受到，由深厚人文精神支持的法國文學的博大與寬容，給予了李劫人超越的氣度，『道德』的評價在李劫人筆下退隱，人性的真與善，上升為『美』。」這同樣是說到了點子上的批評。作者的這些精彩論斷，建基於中法兩個國家以及中國不同時期文學縱橫錯綜的比較之上，顯示了學術視野的相對寬廣。它與前述兩個特點融合到一起，體現了作者不一般的功力。相信本書讀者讀到這些地方，都會與我一樣產生同感，並給予讚賞的。

最後，我還想借此機會就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簡要地談些看法。由於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些文章中關注到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問題（1981 年的《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一文就從文學現代化的角度考察了魯迅小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一書的作者們，曾稱我為「最早提出」以「現代化」視角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人，此後並在

海峽兩岸的有關報刊上引起過人們的注意和討論^{*}。其實，那時我還來不及就這個專門問題系統表達自己的意見。當初我關注它，只是看到中國現代文學在發展中確實存在這樣一條貫穿始終的線索；我以為這條客觀存在的線索，比長期以來我們運用的「反帝反封建」這一主觀的政治視角要恰當得多，完全可以取代後者。我也贊成作為思潮——而不是僅僅作為因素——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應從甲午戰敗之後算起。它作為一種新的質素，對此後中國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無論在文學的內容和形式方面），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顯著標誌，雖然「現代化」或「現代性」絕非衡量文學成就的唯一根據。此其一。其二，文學的現代化或現代性，絕不可與現代主義文學劃等號。現代主義文學只是文學現代化或現代性的一種，除此之外，現代文學還有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等多種形態，它的道路應該是寬廣的。歐洲文學史上雖然歷時地存在過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現代主義諸種文學，但如果用物種進化的觀點來看待它們，以為後起的必然比早先的進步與優越，那恐怕是一種很大的誤解或叫做庸俗的理解。文學上的多元共存（或曰共時性），不僅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也是歐美許多國家的現實，而且終將是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現實。其三，自從科學、民主、個性主義、社會主義等現代思

* 見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錢理群、陳平原、黃子平所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一書。臺灣學生書局 1988 年出版的龔鵬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之解析》一書曾引用並看重這一材料。河北省《文論報》亦曾刊載文章就此進行討論。

潮在中國興起，幾乎同時或稍後，就有其對立面——批判「現代性」的思潮（即後來被稱為「後現代」的思潮）出現——例如梁啟超 1920 年的《歐遊心影錄》。在我看來，所謂「後現代」，其實只是對「現代」的反思、糾偏和補充，它是「現代」的伴生物，卻永遠構成不了一個獨立的時代。其四，「現代性」在器物層面與思想文化層面完全可能互相悖離。物質生產最先進、最現代化的國家如果受反現代、反人文精神的霸權主義思想影響而不加以遏制，終將會對全球構成極大危險。中國二十世紀在文化思想史上獲得的巨大進步，正體現在「五四」之後整整一代知識份子擺脫和告別了王韜、康有為那種強國以稱霸全球的思想。以上各點，是我近十年來早已想說而尚未能說出的一些粗略見解，這次因受到楊聯芬女士著作的啟發順便作了表述，也許能大體代表我對文學現代性問題較完整的思考。其中必定有一些書生氣的並不全面的想法，我也願意得到有興趣研究此問題的朋友們的指正。

嚴家炎

2003 年 5 月 21 日寫畢於上海奧林匹克花園

閱人與讀書

聯芬的書獲在臺灣出版機會，囑我寫些文字，不免有些顧慮。大凡作序者，總是才高德劭，聲隆譽旺。而我與聯芬同輩，才學不逮，妄加置喙，其心惴惴不知何如。我素來疏懶，性好自然，不善假學術以表現人生。面對這樣的專門著作，先失了梳理剔抉的勇氣。幸好，有令晚輩尊敬的學界泰斗嚴先生序在前，字字珠璣，我可免勉力贅論之苦。

在課堂上，針對有的學生自卑，我常鼓勵他們說：不要迷信時髦學者，也不要迷信北大清華。你們天天看的書，有多少是流芳百世的偉大人物寫的。以後畢業，只要認真讀書了，他人問起你是哪所大學的學生，你就說，我是老子和孔子的學生，是李白和杜甫的學生，是柏拉圖和康德的學生。讀書其實就是在讀作者，在和作者接近、請教、交朋友。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許多幽冥的夜晚，都市的喧囂沉靜下去了，捧起經典，慢慢感到靠近那些偉大的靈魂，在品味，在交談，也在詰問。由此，我深切地感受到，對書的解讀，首先就是對作者的解讀。爬滿書籍的那些死寂符號，其實熔鑄了作者生命的精髓，鮮活的感情會在冷靜咀嚼中緩緩復活。

偉大人物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才寄望於寫書，把精神留存下來，使靈魂活下來。聯芬不是偉大人物，也許永遠也不會成為偉大人物。但她的書，同樣是希望延續自己的生

命。對偉大人物的解讀，自有無數崇拜者去完成，而俗世還遠沒那麼多熱情來賦予聯芬這個資格；那麼，我或許可以不稱職地完成這個任務。我想告訴讀者，我所認識和交往的真切的聯芬，以及她生成的那個時代和背景。這樣，被迫壓縮在學術符號裏的她，就可以比較自然地還原。這個還原，也許會幫助讀者對應起來理解她的書。

我與聯芬相識於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是大學同班同學。那大約十年時間，是深得我們這一代人懷念的幸福與痛苦交織的時光。那個年代的價值，與現在比，有另一種值得人珍重的畸形。文革剛剛過去，人民在猶疑與希望中踟躕；天已發亮，幾分恐懼，幾分欣喜，都交織在明滅的黎明中。校園裏兩代人同學的現象不少，有的年至不惑，有的卻乳腥未褪。同學們嚼著菜根，滿懷理想和激情，非常關注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人人自豪，也人人平等。誰學習成績優良，不論高矮美醜、黑白窮富，誰就是大家羨慕與尊重的對象。那時讀大學很不容易，升學率只有 5%左右。那個年代的大學生，享受著社會的尊敬和關愛，也享受著社會主義制度「特色」前的最後優越——全部免交學費。

我對聯芬的第一印象很差，因她剛入學，就提出了每月三塊錢的助學金申請。她是工作後考來的，我想，工作過的人應該有些積存，連國家的三塊錢也不放過，實在太貪。於是，在班委會的討論中，我作為主要「幹部」之一，堅決反對通過她的申請。後來，我知道了內情。她父親早逝，母親沒工作，而且癱瘓在床，她因病休學，沒念高中，兩個哥哥